

月港研究論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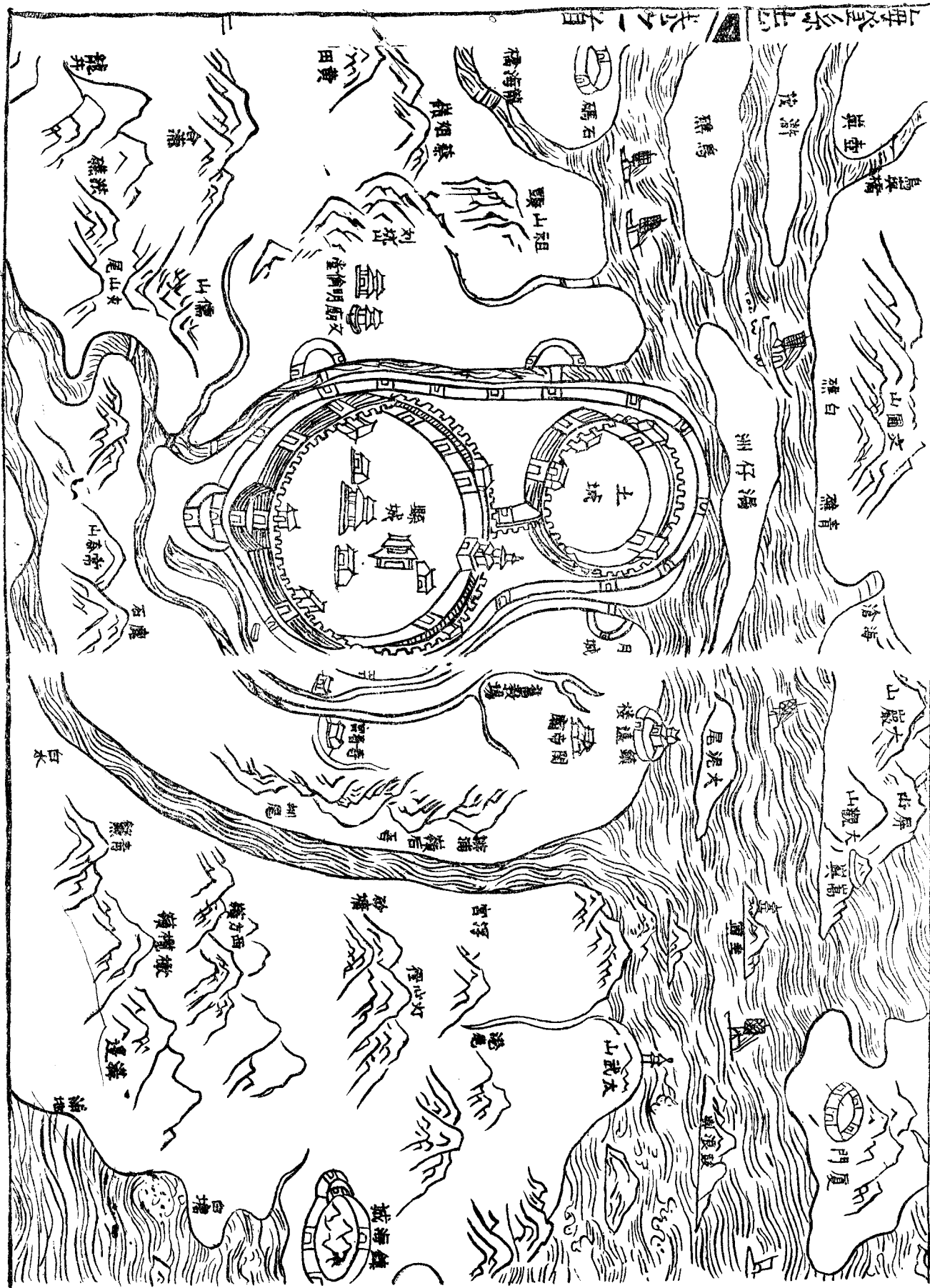


中共龙溪地委宣传部 编印
福建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

月港研究论文集

中共龙溪地委宣传部 编印
福建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

1983年4月



前 言

福建历史学会厦门分会在党政的领导和协助下，于一九八二年冬季，在漳州市举行了月港研究的学术讨论会，会议开得很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本月港论文集的刊出，就是有力的见证。

月港，“港水萦绕如新月，月色晶莹照港湾”，这是多么幽美雅致的名称，惹人回思，回思在明代中叶以后到清初之前，这里曾是我国东南的重要港口，是东南沿海与东、西洋的贸易中心，万商云集，驰声中外。月港的这一盛况，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左右，其兴也有点勃然，其衰也亦有些倏然。这里所编集的许多篇论文，都着力阐明其兴衰的原因。从兴起来说，此处港湾的有利条件，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一带商人反抗明朝闭关自守的斗争等，促成了月港的兴起。而明末对这一带的苛征，明末清初这里的战乱频繁以及清初的“迁界”，厦门港的代兴等，则促成月港迅速地衰落了。

在阐述一般的兴衰因素时，也考虑到骤起忽落的特别因素。固然，事物总有它的发展规律，有它的一般性，而一般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没有特殊性就归纳不出一一般性来；但没有特殊性也就没有事物之间的区别，也就不能说明甲事物何故异于乙事物，无法说明经济和地理等因素相似而何故甲港兴而乙港衰。只有既把握住一般性而又把握住特殊性，才能阐明各个事物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才不致于千篇一律，依样画葫芦。我们在讨论中重视到这点，这是好的，今后如能更深入一步，将会有更大的收获。

其次，许多论文都提到反闭关自守的斗争，是月港兴起的重要因素。从中国历史来看，汉唐封建王朝和国外联系多，商业交通发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说是无远弗届，故至今许多国家的城市中，多有“唐人街”。明代则禁忌多，一再实行闭关自守政策，而人民的反“海禁”斗争也联绵不断，终于冲破了层层障碍，促成了月港的兴起。伟大的人民力量推动社会的发展，这是历史上的又一见证。

再则从月港的学术讨论会来看，福建省有丰富的地方史内容，足资研讨。只要我们孜孜不倦地进行发掘研究，一定能够提供许多光辉灿烂的历史事迹，作为当前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借鉴，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前进。让我们锲而不舍地努力奋斗吧！

韩国磐志

1983年夏

目 录

前 言-----	韩国磐
论明代漳州月港-----	陈自强 (1)
略论明代月港的海外贸易-----	唐天尧 (8)
略论月港的几个问题-----	林文明 (19)
略谈月港的兴衰-----	方文图 (24)
试论明代月港兴衰的原因-----	唐天尧 (26)
试论明代漳泉海商资本发展缓慢的 原因-----	林仁川 陈杰中 (37)
试析月港兴衰的主要原因-----	沈玉水 (48)
试论明代月港兴起的原因-----	潘文贵 (64)
明代漳州月港兴衰考-----	陈杰中 (78)
月港的兴盛与资本主义萌芽-----	郑 镛 (92)
略述明代福建沿海的反走私措施-----	陈泗东 (102)
月港海商在开放海禁斗争中的作用-----	徐健竹 (107)
明代月港地区的海禁与反海禁斗争-----	林蔚文 (119)
论启祯之交闽海寇乱与月港之衰落-----	方文图 (128)
明代月港倭乱初探-----	许镇藩 (136)
浅谈明代闽南倭患对月港的影响-----	黄文英 (143)
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中叶 中西航海贸易势力的兴衰-----	杨翰球 (149)
明代漳州月港的兴衰与西方殖民者的东来-----	谢 方 (167)

明代月港与西班牙的海上贸易-----洪卜仁 (178)

略论我省反高案斗争及其历史意义-----邓华祥 (188)

试论明代月港的历史作用-----陈敏 林斌龙 张国靖 (195)

月港的兴起与闽南华侨-----陈吴泉 (200)

明代漳州月港国内交通探索-----江耀东 (205)

月泉港与古民族-----谢家群 (212)

月港遗迹点滴-----镇 墉 (216)

东溪窑与“漳瓷”-----熊寒江 (221)

张燮与《东西洋考》-----许在全 (223)

游览名山诗清芬 ——读张燮的部分旅游诗-----林斌龙 (230)

月港开辟前后的梅岭-----谢继东 (233)

明代漳州月港资料目录-----陈自强 (239)

·附录(一) 明代漳州月港研究学术讨论会文件·

开幕词-----罗耀九 (245)

闭幕词-----陈泗东 (247)

明代漳州月港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 (249)

·附录(二) 解放前和国外的有关论文选载·

国内港口居重要地位为厦门兴起先声

的月港(海澄)-----胡寄馨 (254)

明张燮及其著述考(要点摘录)-----薛澄清 (261)

下港(万丹)唐人街盛衰变迁考(节录)----- (日)岩生成一 (267)

西班牙与漳州之初期通商----- (美)菲律乔治 (280)

编后语----- (295)

论明代漳州月港

陈自强

明代，“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①”。月港（今龙海县海澄），在漳州城东南五十里，因“其形如月而得名”。该港为九龙江出海处，江面开阔，淡咸相接，潮汐吐纳。其港口起，沿南港顺流往东，经海门岛，至九龙江口的圭屿，再经厦门岛出外海。明代宗景泰四年，月港海外贸易开始兴起。从明宪宗成化十年，到明神宗万历年间约一百五十多年时间，月港逐渐走向全盛阶段。此一时期的月港，比起泉州港、福州港更为繁荣，是我国东南地区海外贸易交通的中心，在世界海上交通和国际贸易方面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到了明朝天启以后，月港才急剧地开始衰落下去。

月港的兴盛

明景泰四年(1453年)，月港的海外贸易开始兴起。成化、弘治间(1465——1505年)，月港“人烟辐辏”，“商贾咸聚”，成为闽南一大都会，有“小苏杭”之称。随着海外贸易的繁荣，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置靖海馆，设通判。四十五年(1566年)置海澄县。隆庆元年(1567年)，明政府正式取消“海禁”，在月港开设“洋市”。此后，月港与海外的交通更加发展，海外贸易更加活跃，到万历年间(1573——1620年)，盛况空前。当时，“四方异客，皆集月港”，往返商旅，相望于道。每年仲夏至中秋的风汛期，由月港发舶的商船多以百计。这些商船大者宽三丈五、六尺，长十余丈，载重二百吨以上；小者宽二丈，长七、八丈，载重一百多吨。来往船只之多，载重吨位之高，在当时是相当突出的。

“泉漳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皆然^②”。据，《东西洋考》、《顺风相送》等书记载，月港的海舶到达东西洋

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中。西洋方向的主要有：交趾、占城（以上在越南境内）、暹罗（今泰国）、柬埔寨、大泥（今泰国南部）、吉兰丹、丁机宜、彭亨、柔佛、麻六甲（以上皆在马来半岛）、旧港、阿齐（以上在苏门答腊岛）、爪哇、诸葛担篮、文郎马神（以上两个在加里曼丹南部）、吉思地闷（今帝汶岛）等。东洋方向的主要有：大港、彭家施兰、吕宋、三宝颜、棉兰老、苏禄、民都洛（以上皆在今菲律宾）、美洛居（今马鲁古群岛）、渤泥、文莱（以上在加里曼丹岛北部）等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吕宋居首位。因为其地距漳最近，故贾舶多往。“民初贩吕宋，得利数倍。其后四方贾客丛集，不得厚利，然往者不绝也③。”许多商人往往久居不返，渐至数万。万历三十一年，发生了西班牙殖民者屠杀吕宋华人的血腥事件，死难华人达二万五千多人。其中，“澄人十之八⑦”。除吕宋外，爪哇、旧港、麻六甲等地，也遍布月港海商的足迹。《西洋番国志》“爪哇”条记，爪哇国人有三等，其中一等为唐人，“皆中国广东及福建漳州下海者”。《瀛涯胜览》“旧港”条记：“国人多是广东，漳泉逃居此地”。

日本也是月港商船经常抵达的重要国家。由于倭患，明政府严禁民间与日本通商，即使隆庆元年取消“海禁”后，也只准贩东西洋，依然禁止与日本通商。但是，私商“率多潜往”。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福建人因往日本贸易，为台风所飘而至朝鲜者，达千人以上。可见，私往日本贸易的闽商很多，且其中许多是漳州人。嘉靖后期，中日官方认可的“勘合”贸易中断后，日本当局曾致函福建总督，请求恢复，没有得到允许。“勘合不成，然南京、福建商舶每岁渡长崎者自此逐年增多⑤。”万历四十一年六月，“漳州商舶六艘入长崎”⑥。四十四年闰六月，“又有漳州商舶载多额砂糖来纪伊之浦津”⑦。崇祯元年（1628年），在漳州船船主的倡议和资助下，明僧觉海等人在长崎岩原乡建福济寺，俗名漳州寺。这是漳州人到日本经商的见证。

那时，从月港输出的货物主要有：丝绸、布匹、瓷器、茶叶、砂糖、纸张、果品等。《闽部疏》云，“凡福之抽丝，漳之沙绢，

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顺昌之纸，……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湖州的生丝，景德镇的瓷器也由月港远销海外。而输入的外国货物，据《东西洋考》记载，除传统的香料、珍宝外，大部分是农产品、手工业品和手工业原料。如番米、椰子、绿豆、番被、番藤席、草席、番纸、番泥瓶、番镜、火炬、粗丝布、西洋布、漆等，还有各种皮货（沙鱼皮、獐皮、獭皮、犀牛皮、马皮、蛇皮、猿皮等）以及各种矿物（金、锡、铅、铜、矾土等）等一百多种。这些种类繁多的中外物资的交流，既互通了有无，又丰富了人民生活，对繁荣中外经济，发展生产，很有裨益。

月港兴盛的主要原因

洪武初年，明政府就实行“海禁”政策，既严禁中国商人与海外通商，也禁止外商来华贸易。“海禁”政策，它违反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摧残了海外贸易，也伤害了沿海人民的切身利益。月港初期开展的只是一些民间的海外贸易。到了明代中期，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增长，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的弊病日益显露。明穆宗准许福建巡抚涂泽民奏请，有限制地取消“海禁”，月港开放“洋市”，准贩东西洋货。于是，月港海外贸易的地位得到了政府的确认，海外交通和海外贸易更加繁荣。明政府在月港设置了督饷官吏，负责税收。刚开禁时，月港的舶税仅三千多两，而万历四年（1576年），增至万两，十一年（1583年）再增至二万多两。舶税的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开设洋市后月港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万历间，中丞周起元满怀喜悦地说：“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剗舳舻，分市东西路，其捆载奇珍，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他总结了开放月港的利处：“有汉之威远而师饷不内耗，有唐宋之通货而情况不外泄。然则澄之舶政，岂非经国阜财，固圉强边之最便者哉！”⑧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日本侵犯朝鲜，福建又实行“海

禁”。但为时不久，地方当局又取消海禁，并出布告招谕：“凡留贩人船，不论从前有引无引，日远日近，俱许驾回，诣官输餉如故事。凡私通及压冬情罪，一切宥免。”布告出后，“越贩商人胡台、谢楠等二十四船，闻抚绥令，皆驾船回沃^⑨。”二十二年，舶税收入骤增至二万九千多两。一年间的曲折、变化，说明月港的兴盛正是海外贸易日益发展的结果。

月港的兴盛与漳州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代，漳州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为月港的兴起提供了物质基础。而月港的兴盛，又促进了漳州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从手工业来看，漳州地区的造船业和航运业是相当发达的。早在宋代，漳州与泉州、福州、兴化并称为福建四大造船地点。绍兴年间，为纲运的需要，漳州被征用的海船每年达一百二十多艘。明代，漳州是著名战舰“福船”的制造地之一。中小哨船也多出于漳州。俞大猷在广东剿倭时，曾派人到漳州督造包括“福船”在内的海船大小八十多艘。除官府营造战舰外，许多海商也竞相制造用于海外贸易的商船。“福船”的质量，戚继光曾给予高度评价，但“其坚致不及贾客船”。当时，建造一艘大商船，“费可千余金”，每年的修理费“亦不下五、六百金”^⑩，其造价是战舰的三倍。花费如此巨款建造商船，只能是积极从事海外贸易且拥有雄厚资金的大海商和豪门巨室。这种人叫舶主。他们与一般的海商不同，一般的海商是搭附他们的船只出海贸易。《东西洋考》说：“每船舶主为政，诸商人附之”^⑪。舶主不由官府任命，不向官府负责，是自由商人。月港的商舶，除舶主外，尚有财副、总管、直库、阿班、头棹、二棹、大缭、二缭。舵工（二人）、火长和一般的水手等。他们都是舶主招募而来的，以出卖劳动力为生。舶主与船工的关系，是一种“富家以财，贫人以躯”的雇拥关系^⑫，带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

漳州的纺织业也十分发达。纺织品种众多，有丝、纱、绢、绸、

缎、绒、绉、绮罗、丝布、苧布、罗布、蕉布、麻布、葛布、棉布等。其中，纱、绢、绸缎尤为精美，驰名中外，海内珍之。姚士麟《见只编》记：饶之瓷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尤为彼国（日本——笔者）所重。”

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出现了以进口物资为原料的手工行业。如牙雕，“俱贾舶市来者，漳人刻为牙仙人之属，以供近玩”，“又有牙箸、牙枋、牙带、牙扇”等^⑬。

从农业生产来看，经济作物有很大的发展，而且具有商品化的显著特点。糖蔗、水果是漳州主要的经济作物。随着海外交通的发展，蔗糖、柑橘、荔枝成了主要的外贸商品。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加工，比起其他农产品，可赚取数倍的利润。商业性的利润，又成了经济作物发展的杠杆。“种蔗煮糖，利较田倍，多夺五谷之地以植之”^⑭，“果贵荔枝，红柑次之，俗多种，家比千户侯”^⑮。当时的月港农村，“处处园栽橘，家家蔗煮糖”。烟草从吕宋传到漳州后，农家普遍种植，并迅速商品化，“田家种之，颇获厚利”。不久，漳州的烟草“反多于吕宋”并“载于其国售之”^⑯。

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活跃，明代中期后，洋银在漳州地区逐渐流通。所谓洋银，主要指西班牙银币。我国商舶到吕宋时，西班牙商人一般用西班牙银元易货。因此，西班牙银元大量流入漳州，并在市场上通行。明末，荷兰银元和日本宽永钱币也输入漳州。洋银的流入与通行，又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

月港海外贸易的特点

与宋元时期的泉州港比较，明代漳州的海外贸易具有下列四个特点：

1、宋元时期的泉州港是一个官方港口，它由官方开港，以官办贸易为主，同时也允许民间商人贸易。而月港是一个以民间贸易为主的港口。

2、以中国商人赴异国贸易为主。如《东西洋考》所说：“市舶之设，始于唐宋，大率夷人入市中国。中国而商于夷，未有今

日之伙者也^{①⑦}”。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明代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商业资本日益活跃的必然结果。它表明，我国封建社会的商业资本活动已开始突破封建统治的束缚而走向国际市场；表明明代的海外贸易已从“朝贡”关系的贸易转向国际关系的贸易。跟朝贡关系的官方贸易不同，它不是为了显耀皇威，“怀柔远人”的政治需要，而是为了追求“其去也，以一倍博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①⑧}的高额利润。它与西方殖民者的海外贸易活动也不同，不是进行海盗式的掠夺，更不是为了抢占殖民地，而是一种互利的和平的正常贸易。

3、月港对外贸易中，输入的货物以日常生活用品为主。宋元时期泉州港的海外贸易主要由官方经营的，以输入香料、珠宝等高级消费品为主，以满足宗室、贵族、大官僚和大地主奢侈生活的需要。而明代漳州月港的海外贸易以私商经营为主，输入品主要供给对象是一般的地主和广大的市民、侨属，因此，以输入日常生活品为主。

4、月港海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东南亚和日本。这与宋元时期的泉州港也有很大的不同。宋元时期，西洋（北印度洋沿岸国家和地区）是我国海外交通的主要航线。贸易的主要对象是阿拉伯国家。十六世纪，西方殖民者不断向东方扩张，逐渐取代阿拉伯国家，控制了北印度洋的海上交通。在明王朝“海禁”政策禁锢下的我国民间私商是无力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相抗衡的，贸易的主要对象，必然要转向靠近我国的东南亚地区和日本。

月 港 的 衰 落

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开始，荷兰殖民者为称霸海上，进行殖民掠夺，以“打开对中国的贸易”为名，不断骚扰我国东南沿海。天启二年和四年（1624年），先后侵占了我我国领土澎湖、台湾。荷兰侵占澎湖后，封锁九龙江口，横行于台湾海峡，抄掠我国大小船舶，切断我国与菲律宾群岛的贸易。仅1622年10月18日一天，就烧毁我国大小商船六七十艘，从1622年10月至1623年

5月，约半年时间，被荷兰殖民者绑架到澎湖，准备运往巴达维亚贩卖的我沿海居民达一千四百多人。我沿海居民，“格于红夷，内不敢出，外不敢归^⑨”。于是，“洋贩不通，海运梗塞”^⑩。连荷兰殖民者也不得不承认，由于他们的海盗行径，“中国人再也无法自由地前往马尼拉及其他各地^⑪”。曾是生气勃勃的月港，由于荷兰殖民者的侵扰，日趋萧条。

清初，月港是郑成功抗清力量与清朝争夺之地，这里战事不断。为平定郑氏，清政府厉行“海禁”，并实行“迁海”，把沿海居民迁入内地。当时，自江东到九龙江以东地区皆为“弃土”。这给月港的海外交通带来极大的破坏。

月港是一个内河港口，须经厦门港出海。因此，月港势必为天然良港厦门港所代替。万历间，政府在厦门设置“饷馆”，月港商船必须到厦门港盘验。天启间，厦门已直接开展海外贸易。郑成功驻厦时，又以厦门为中心积极开展海外贸易。这样，厦门作为一个对外贸易的优良港口登上了我国海运交通的历史舞台，而月港便从此衰落了。

——载《福建论坛》1982年第2期

注：①《嘉靖东南平倭通录》。

②、⑬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六。

③何乔远《闽书》。

④（乾隆）《海澄县志》卷十八。

⑤、⑥、⑦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第二十二章。

⑧周起元《东西洋考序》。

⑨、⑰张燮《东西洋考》卷七。

⑩、⑱《东西洋考》卷九。

⑫《海澄县志》卷十五。

⑬《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1104。

⑭《福建通志·风俗志》。

⑮《漳州府志》卷二十六。

⑯姚旅《露书》卷十（转引自《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册）。

⑰《熹宗天启实录》卷三十二（见《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

⑱《澎湖平夷功次残稿》（见《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

⑲《难忘的东印度旅行记》（见《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

略论明代月港的海外贸易

唐 晓

明代月港，原属漳州府龙溪县，隆庆元年（1567年）设立海澄县①，月港遂属海澄县。月港“外通海潮，内接山涧，其形如月，故名”②。

明代月港曾是中外商船鳞集，闻名于世界的我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在中外贸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文试就月港海外贸易的性质、特点和影响，作一些初步探讨。

月港海外贸易的概况

明朝中后期，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提高，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福建省沿海地区的农民，“昔耕于田，今耕于山”，他们“不惮陡峻岩，辟草莽”，进行多种经营。③把茶、桐、竹、松、杉等大量投入市场，成为交换的商品。当时，“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④，南北贸易十分频繁。

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福建省从明中叶开始，在矿冶、航运、制茶、榨糖、造纸和焙笋等行业中，先后出现了“富者出货，贫者出力，懋迁居利”⑤，或“富家征货，固得捆载归来，贫者为庸，亦博升米自给”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因此，当国内市场不能满足其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时，它必然扩大到国外市场去。这必然要促进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月港的海外贸易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兴起和发展的。

月港的海外贸易，是在艰苦奋斗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明朝建立后第四年，明政府就“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规定凡“敢有

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⑦。严禁我国民间进行海外贸易，也禁止外国商人来华贸易。这种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危及了沿海人民的生活。沿海人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海禁”的阻挡，进行海外贸易。

景泰四年（1453年），“民多货番”^⑧，月港的海外贸易开始兴起。成化、弘治间，月港“风回帆转，实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鹜争持，以舶主上中之产，转盼逢辰，容致巨万……称小苏杭”^⑨。十六世纪，西方殖民者东侵，明朝与东西洋各国传统的“朝贡贸易”日益衰落，中外商船“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驻扎。于是利归于闽，而广之市井萧然矣”^⑩。正德以后，月港的海外贸易不但大大超过了福州港，而且也超过了广州港，成为我国最繁荣的外贸港口。这时停泊在月港的外国商船很多，仅葡萄牙的商船就有十三艘。^⑪隆庆元年，明政府开放“洋市”，准许福建商人经营东西洋海外贸易。从此以后，直至万历年间，月港的海外贸易发展到最高峰。月港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东西洋考》周起元的序写道：“穆庙时（即隆庆）除贩夷之律，于是四方之贾，熙熙水国，剗舳舻，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那些从事海外贸易的“富商巨贾，捐亿万，驾艤艫，植参天之高桅，悬迷日之大篷，约千寻之修缆”，航行东西洋各国^⑫。当时每年进出月港的大商船，多达二百余艘，^⑬“少亦不下六七十只”^⑭。明朝政府在月港的商税收入，由每年三千两银，猛增至二万九千多两银^⑮。《海澄县志》在描写当时月港的盛况写道：月港“寸光尺土埒比金钱，水犀火浣之珍，虎魄（珀）龙涎之异，香尘载道，玉屑盈衢，画鹢迷江，炙星不夜，风流较于晋室，俗尚轶乎吴门”，“嬉游歌舞日以卜夜”。月港与印度支那半岛和南洋群岛各国，以及朝鲜、琉球、日本等四十七个国家和地区有着直接的贸易往来^⑯。并且以吕宋（今菲律宾）为中转站，与欧美各国进行间接贸易。由月港进出口的货

物，多达一百余种。

但是，这个世界闻名的商港，到了天启年间（1621—1627年），在中外反动势力的摧残下，便急剧衰落下去。关于月港兴衰的情况，本人已有另文论述，这里从略^{①⑦}。

月港海外贸易的特点和性质

明代月港的海外贸易，与我国历史上其他的外贸港口相比，有着显著的不同特点。我国的海外贸易，历来是由政府的“市舶司”管理，进行“朝贡贸易”，外贸港口都是由政府指定开设的，如广州、泉州、福州等。月港不是明政府规定的外贸港口，它的海外贸易活动，是违反明政府的“海禁政策”的。因此在这里进行的海外贸易活动，是民间的贸易活动，开始一般是以“走私”的形式出现的。也有的商人为了防止官兵和殖民者的抢劫，组织起武装力量，以“海寇”的形式出现。隆庆元年开放“洋市”后，月港的民间海外贸易才得到明朝政府的认可。当时官方海外贸易的船只称“市舶”，民间海外贸易的船只叫着“商船”。“然市舶之与商船，其说稍异。市舶者，诸夷船泊吾近地，与内地民互市，若广之豪镜沃然。商船则土著民醵钱造船，装土产，径往东西洋而去，与海岛诸夷相贸易”^{①⑧}，若月港便是。二种贸易性质不同。因此，月港海外贸易的特点，是民间的海外贸易。

其次，月港的海外贸易是以我国商人赴海外贸易为主的。张燮说：“市舶之役，始于唐宋，大率夷人入市中国。中国而商于夷，未有今日之颖者也”^{①⑨}。改变了我国海外贸易历来以外国商人来华贸易为主的状况。

第三，月港的海外贸易，是以出口我国手工业品为主。宋元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虽然已经相当发达，但海外奢侈品的输入多于本国手工业品的输出，对外贸易均系入超。因此银铜钱大量流出，影响了国内货币流通。而月港的海外贸易则截然不同，对外贸易由入超变成了出超，外国银钱大量流入我国，这是我国对外贸易史上的新发展。